团结奋进，为开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新局面而努力（代序）

李俊康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是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开展起来的，如今，在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10多年的研究成果证明：桂林抗战文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斗争所形成的宝贵文化遗产，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铸造下的新生。

桂林，素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却汇集了一大批“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文人学者，推涌起一股拍天的文化浪潮。据初步统计，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学者就有1000多名，可谓人才荟萃。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将近200种，真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在桂林开设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有200余家，一条桂西路，全是书店，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出版上千种文艺书籍，繁花似锦，精彩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呈。文化演出团体有60余家，10多个剧种同时上演，使人应接不暇，可谓盛况空前；群众性的歌咏会、诗歌朗诵会、街头诗画展更是有声有色。这种以反法西斯为主旋律的文化运动，发生在当时只有30万人口的国统区桂林，留给我们的思索，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自豪感，而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文化的领导和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强性、凝聚力的深刻表现。

历史既不能割断，更不能遗忘。搜集、整理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资料，总结、探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研究、继承、发展桂林抗战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14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经过广西及兄弟省市的学术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专业和业余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继1988年成立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后,1993年6月，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又宣告诞生，至此，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已形成了较大的规模。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不辱使命，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已出版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资料集20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抗日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桂林文化城大全》、《桂林抗战文艺词典》、《桂林文化城大事记》、《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桂林文化城史话》等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获得好评。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学术成果的涌现，也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了我们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实力与价值。

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文化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者，继承了桂林抗战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为搜集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资料，同志们踏遍千山万水，历

尽千辛万苦；为构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大厦，同志们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同志们正是以这种不懈的努力来完成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事业。我们知道，事业的发展决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但我们既然选定了这项事业，就应有踏荆棘、经风霜、吃大苦的思想准备，同时亦具备了成就大事业的自信心。我们既不能有负于创造桂林文化城的前辈，又要无愧于子孙后代。今后，我们要以更加扎实的工作，去构建桂林文化史上的又一座历史里程碑。

一、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原则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华的伟大斗争。当日寇铁蹄蹂躏国土，东北、华北失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时，一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和救亡团体云集桂林，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使桂林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成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哨阵地。从而使得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和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历史，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以便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开展文化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成为我们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的指导思想。

但是，由于当时桂林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造成了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既要认识到党对桂林抗战文化的领导作用，包括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作用，同时亦要防止理解上的片面性，认为只有研究共产党员的文化工作者和思想上进步的文艺家，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选择。其实，正面和反面，都应该在我们研究视野之内。

学术研究，有几点很重要，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应全面系统地做好资料工作，就为“实事”提供了基础，理解掌握好指导思想，就为“求是”提供了保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能既探求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又为现实的文化工作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二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会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洞开一个新天地。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要强化建设意识，即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要强化精品意识，这就要扶持和组织好研究成果的生产，尤其要不断推出一批有质量、有影响的“拳头产品”，影响全国，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成果；要强化“主旋律”意识，每个时代都有高昂激扬的主旋律，当年的桂林就是以其鲜明的主旋律成为抗战文化名城的。今天的时代仍然有着激越的主旋律，当主旋律与多样化高度统一，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能很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注意民族的地方的特色，桂林有着闻名天下的自然景观，抗战文化运动，又为桂林谱写出灿烂的篇章，我们要善于从这独特的地方优势中寻找我们研究工作的突破口，不仅弘扬民族气节，也光大民族文化，尤其要特别注意去研究与桂林抗战文化有关的广西的人和事。做到这些，我们的事业才有较大和较快的实质性

进展。

二、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视野及相关课题

我们研究桂林抗战文化，从宏观视野上讲，应该只是我们这个事业的起点，而决不是目的。我们必须有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为中心，辐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信心和勇气。革命圣地延安也好，国统区的桂林、重庆、昆明也罢，那时的文化运动，都是当年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构成抗战文化运动的燎原之势。“海纳百川，乃容乃大”，我们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当年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来源是那么的广，影响是那么大，而今天我们的研究队伍还很有限。况且，我们研究的内容，还较多地局限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要扩大研究视野、政治的、军事的、历史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学的、艺术的、新闻出版的乃至宗教、旅游的，都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从纵的方面讲，桂林抗战文化城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激越的浪花。从横的方面看，我们可以把桂林抗战文化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范畴中来进行比较研究。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应有能力和勇气组织一次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文化研讨会，来证明我们无愧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后人。机不可失，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战斗过的文化老人已屈指可数了，时不我待，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扬鞭策马的奋进。我们要以丰厚的研究成果来证明我们的研究实力。

我们的研究课题，是否可以从下列诸方面进一步拓展加深：1.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传播与实践； 2.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名人与桂林抗战文化城；3.历史事件与桂林抗战文化城；4.桂林抗战文化城与诸种艺术门类； 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6.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7.文化名城与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等。研究这些课题，总结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除了体现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还重在探讨其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现实意义。唯其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才不仅仅限于只为后人保存了文化，还进一步创造了更为灿烂的文化事业。

三、为开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1．进一步提高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

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理应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关注和敬仰。目前，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影响较有限，大多还只是限于学术界。我们应该拓展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扩大我们各地的千千万万的游客，在感叹桂林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的同时，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也能有所了解。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继承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崭新的桂林文化城而不懈努力。

学术研究是对真理的不断探求过程，对于真理的探求必须有一种执著的献身精神。当年，为指导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周恩来同志曾三次亲临桂林。可以这样说，周恩来同志早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直到东渡日本之后，才从“潇潇雨，雾蒙浓”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 40年代，20多岁的秦似与同

仁一起在桂林创刊《野草》，不是认为“野草”只是希望“从剥落的旧墙、从万层的古塔，从不长五谷的衰老的地壳透出一点绿来”吗？前辈文化人对于真理追求的执著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所应该继承的优良传统。

对于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除了理论界、学术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取得一致共识外，领导者、决策层乃至全体人民也应该有明确的认同，这样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我们事业的发展就有希望。

2．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壮大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队伍。

文化建设的真正关键在于文化人，没有文化人，一切都将是空谈。昔年桂林文化城成就的取得就在于有一批同仇敌忾的文化人才群体，我们今天研究事业的发展，也必须有一支同心同德、声势浩大的文化队伍。

现在，我们的研究队伍正逐步扩大，实力也较强，但和当年创建文化城时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队伍相比较，就显得不相称。可见我们壮大队伍的紧迫感和必要性。更何况，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多数的学者已是满头银丝了，老学者有自己事业的紧迫感，但培养新一代的学者专家，正是我们事业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如何培养人才，应是我们所有文化单位、教育单位、研究会的头等大事。现在有些高校已开设了桂林抗战文化史课程，这种从学生抓起的做法很好，我们就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人才培养。

3．建立资料中心，创办刊物，为1995年的研讨会作准备。

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理所应当建立桂林抗战文化资料中心，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历史责任而无

法向后人交待。

当然，限于各方面的条件，我们有时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只能调动我们的一切力量，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迅速抢救一批资料，再创办一些有质量的刊物，到1995年，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本广邀四方来客。

何况，比起桂林文化城的创始者，我们又拥有了他们连想都没法想过的环境、条件，既然他们能在艰苦条件下建造起一座文化城，我们就应该让这座大厦高耸入云。

我们的事业虽然很艰难，但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往前走，人民不会忘记在文化城中战斗过的文化前辈，历史也将记载下为今天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文化人。桂林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地灵、人杰，绮丽的自然景观和绚丽的人文奇观的融汇，造就了桂林辉煌的历史，美好的现实，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我们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桂林将拥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桂林文化城史话》序

秦　似

抗日期间，桂林曾有“文化城”之称，指的是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到1944年桂林撤退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桂林成为了抗战中国的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此外，还有两个中心，即重庆和昆明。重庆成为文化中心之一，时间与桂林差不多，但由于它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思想控制比较厉害，因而不如桂林的文化活动开展得那样的蓬勃（至少1942年以前如此）；昆明则是在后期，即桂林沦陷之后才成为新的中心，不久，抗日战争随即结束，因而时间比较短暂。

桂林文化城的特点，是当时很多全国知名的文化人，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戏剧工作者、音乐界、美术界人士，都先后来到过桂林，留下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呐喊、而斗争的声音和事迹。虽然他们留在桂林的时间或长或短，或流动不定，但由于有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一条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桂林的革命文化运动是贯彻始终，不断发展的。由于我们党利用了桂系与蒋介石之间、国民党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冲击与推动，也就使得桂林文化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为当时的“正统”思想所不喜甚至所不容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城。因此，桂林文化城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许多大城市相继失陷，坚持积极抗日的进步

力量与消极抗战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深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

现在回过头看，又已将过去了半个世纪了。桂林文化城这一段历史，对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已是陌生得很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五六十岁的人，不少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桂林文化城的影响；我们更不能忘记，桂林文化城对于在抗日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这一段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紧密相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是占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的。

可惜的是，对于桂林文化城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很赶不上客观上的要求。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国外学者的来信，对于桂林文化城历史资料的搜集表示十分关心，他们很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材料，可是得不到。前些年有些大专院校编写的《现代文学史》，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对桂林文化城的章节只能写得十分简陋。这都说明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桂林文化城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一件迫切要做的工作。

去年，适值解放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戏剧会演——“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许多当年参加了这个活动的戏剧家、文艺工作者回到了桂林，聚首一堂，共同回忆，对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评价，对有关的资料也有了不少的补充。这是很难得的。我们希望，类似这样的回忆、讨论、研究活动能进一步开展起来，对于桂林文化城的历史资料，及时加以抢救，是极有必要的。

现在，魏华龄同志写的这一本《桂林文化城史话》，就是在这个方面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这本小书，就文化活动的

各个方面，分别做了一些叙述，也初步收集到了一些史料，尤其收集到了一些照片，是相当珍贵的。其中有两幅，是这次“西南剧展40周年座谈会”上收集到的。这本《史话》，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于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来说，仅仅是跨出了小小的一步，还有许多课题摆在面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这大量的工作,就有待于更多的人的努力了。现在,有关方面正在筹备成立桂林文化城研究会之类的学术性团体，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对推动收集、整理和研究桂林文化城历史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史话》虽是一个开端，而且以一人之力，所能收集到的东西毕竟有限，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开拓，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关心、重视对桂林文化城历史资科的抢救工作，并开展更为系统、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研究，这对于继承革命历史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将是有意义的。

本书作者提出一个观点，桂林文化城的活动虽也有过一些起伏,但从1938年到1944年是贯彻始终的，认为1941年以后即走向“衰落”是不确当的。我以为这个观点很对。因为事实上，尽管环境日益恶劣，但党的领导始终存在，各个文化领域内始终是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统一战线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到了后期还更为扩大了。像“西南剧展”、“国旗大游行”、“文化界抗敌协会”等几件大事，都是在党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形式进行的，都取得了胜利。

这篇序言，我原建议请更适合的前辈来写，但由于作者和出版社盛情相邀，要我来写，推托不掉，只好写了。不当之处，请大家给予指正。

1985年元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

林焕平

桂林有历史文化名城的沿革，又有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光辉事迹。今天看来，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可以说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要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一要研究延安，二要研究桂林。或者说，要研究国统区，首先要研究桂林，桂林有着很强的典型性。桂林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文化城。

所以，全面整理、出版、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史料、事迹、著作等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桂林文化城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是抗日战争的大形势所决定的。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跑到桂林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香港，原来逃亡香港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又涌到桂林来。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结果。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等，以拥护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大义，对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桂系元老李济深，开展了巧妙而又成功的统战工作，使桂系相对地保持着民主气氛。

三是桂系与蒋介石有尖锐复杂的矛盾。

抗战之前，有过蒋桂大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桂系的军队调到前方，阴谋借日本军阀的飞机大炮摧毁桂系的军事实力。想不到台儿庄大捷，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桂系的威望与实力。李济深是福建人民政府的领袖，失败后，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砀山好几年。这样，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又团结，又分裂；又抗战，又内战；形成复杂微妙的矛盾斗争关系。这使桂系对共产党保持又推又就的关系，而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同时，桂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重这批文化人增加他们手中的头寸。

这样，桂林文化城就随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浪形地向前发展，而成为文化史上的罕见的文化现象。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1938年11月开始，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许多文化人撤退到桂林来，《救亡日报》也从广州撤来桂林复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便以《救亡日报》为中心，有效地开展统战工作，把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化运动推向第一次高潮。

第二阶段是低潮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在国统区实行反共恐怖政策，《救亡日报》、生活书店等被查封，夏衍等大批文化人逃亡香港，桂林文化城走向低潮。

第三阶段是桂林文化城再次兴起走向最高潮。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25日日寇占领香港。原来逃亡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以激越的爱国主义热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从日寇的刀光剑影下潜逃回到桂

林。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批爱国的文化人归来。在贯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中，桂系与蒋介石有程度不同的差异，特别是国民党军委会西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将军，对这批爱国文化人的归来比较地采取宽容和欢迎的态度。茅盾、夏衍、梁漱溟、金仲华、蔡楚生等人都先后脱险到桂林来了。广大爱国文化人又积极地开展文化工作，把桂林文化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政治经济、历史、新闻出版、教育等方面。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集中在桂林的主要有：

文学：茅盾、巴金、邵荃麟、胡风、艾青、艾芜、王鲁彦等；

戏剧：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熊佛西、瞿白音、杜宣、朱琳、石联星等；

电影：蔡楚生等；

音乐：张曙、李凌、赵风等；

美术：何香凝、徐悲鸿、关山月等；

政治经济：千家驹、沈志远、秦柳方、冯和法等；

历史：宋云彬、傅彬然等；

新闻、出版：范长江、夏衍、金仲华、刘思慕、俞颂华、陈劭先、陈此生等；

教育：陶行知、马君武、梁漱溟、杨东莼、唐文治、冯振、雷沛鸿、吴涵真、林砺儒、董渭川、庄泽宣等。

这些著名人物的代表作品，多半都是写在桂林文化城里，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艾芜的《山野》、《故乡》及《文学手册》，夏衍、田汉等

合作的《再会吧，香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在桂林的土地上诞生的。

中国文化界著名人物云集桂林，文化工作自然就有出色的表现。例如：书店林立，当年的桂西路就是书店街；杂志如雨后春笋的出版，影响广泛的有《文化杂志》（邵荃麟主编）、《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文艺杂志》（王鲁彦主编）、《世界知识》（金仲华主编）、《半月文萃》（肖聪主编）；出版社到处可见，著名的有文化供应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等等。

后期桂林文化城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是西南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盛举，集中广西、广东、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的戏剧工作者于桂林，人数不下千人；演出剧种计有话剧、京剧、桂剧、粤剧、湖南花鼓戏、彩调等，演出剧目丰富多彩，有抗战戏、古典戏、翻译戏。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百花齐放”，倒真正体现出“百花齐放”。西南剧展，对以后的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南剧展，不仅在戏剧本身是戏剧史上的典型，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突出典型。这表现在如下的事实：

西南剧展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是当时西南各省的军政首脑：军委会西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湖南省主席罗卓英等；会长是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却是欧阳予倩和田汉。这样，既有利于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又可以广泛地组织、调动数以千计的戏剧工作者到桂林来会演。

西南剧展不仅在当时是文化工作与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工作成就与工作经验，即使在90年代的今天，仍有深

切的借鉴意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人自觉地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自觉地贯彻共产党的拥护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政策，使桂林成为西南民主进步的堡垒。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有重要意义。这早已为世人所认识。不仅在国内，在日本、在西方、在苏联，都有专家在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

桂林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她的最大优势是山水甲天下。陈毅同志题诗“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就是着重从这方面说的，然而，历史文化名城，亦是它的一大优势。过去这方面还开发不够。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历史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应当把她突出出来。

国内外的游人的旅游趣味，越来越丰富与提高。他们不仅陶醉甲天下的山水，更要欣赏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增长他们的知识。所以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开发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名城的旅游资源，尤觉刻不容缓。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动机和目的之一。

《桂林文化城大全》有自己的特色。一般丛书，大体只是收集原著，略加校订，甚至只是收集有关资料而已。即是说，只是历史资料的性质。这当然也是可供研究家参考。《桂林文化城大全》，则既具资料性，又具研究性，是在资料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原则下编成的。每卷有一篇两三万字的综合性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综述和评价该卷内容，对全卷作基本而又深入的研究。对每个文化人抗战时期

在桂林的活动与业绩，作简明扼要的介绍。对收入的每一部重要著作，作简要的评点。若不收入书内，亦附写作年表存目，以见全貌。这样做，既可以保存当年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又可见出今天编著者的研究成果，使专门的研究家于研究时获得捷径，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至于一般读者，从中可深受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革命传统教育，亦可得到种种文化知识，获益倍增。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它，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如果我们放弃责任，既对不起创造文化城的前辈，也为后代子孙所讥评。

创造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前辈们是不朽的，为后代子孙所景仰：继承和发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同志也是光荣的，为后世子孙所尊敬。

光荣属于不断地为祖国文化繁荣而辛勤工作的人们。

1991.6.20于独秀峰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